

中蒙劃界史迹初探(下)

——從兄弟到鄰居

● 劉曉原

編者按：本文第一至五節已於2020年6月號刊出；本期刊出第六至十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劃界問題^①，是中華民國遺留下來的。這裏有三層意思：第一，如果沒有中華民國政府對蒙古獨立在法律上的承認，就不會有中蒙劃界問題；第二，中華民國承認蒙古獨立的兩個前提條件——1945年蒙古全民公投和按照中國地圖確定領土範圍，在對蘇外交中僅實現了前者，這就給後繼者處理劃界問題時在法律和觀念上預設了問題；第三，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之初的國家觀與中華民國有很大的不同，二者的歷史性承接又將中蒙劃界推遲了十數年。

六 兄弟鬩牆

1945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中華民國與蘇聯展開了一場對中國和東亞的戰後命運都至關重要的外交博弈。面對美、英、蘇在雅爾塔會議(Yalta Conference)上的強權外交和蘇軍入華參戰的強大壓力，中華民國政府被迫接受蘇聯所要求的蒙古獨立，希圖以此換取戰後同蘇聯的合作^②。中蘇談判期間，蔣介石在給中國代表團有關放棄蒙古的最初指示中，根據當時國際政治推崇的民族自決原則和領土主權原則，提出蒙古舉行全民公投，並以中國地圖為根據確定中蒙邊界^③。在蘇聯政府看來，在蒙古舉行全民公投是一個可控的過場，因此可以接受。但是蒙古的領土問題也就是蘇聯的勢力範圍問題，對此蘇聯向來是錙銖必較，不能輕易接受中國對蒙古領土的立場。雙方談判的最終結果是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使用了一個模糊的概念，按民國時期的行文則是中國承認蒙古在公投獨立後，「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

界」④。從中蘇之間的外交語言來看，對於蒙古來說，所謂「現在之邊界」其實就是蒙古實施公投的地域範圍⑤。下面還會講到，「現在之邊界」的概念對中國處理同蒙古劃界問題時的影響。

自1920年代以來，雖然蒙古的獨立狀態向未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承認，但是實際上雙方早已形同異國。蘇聯在蒙古推行蘇維埃化，以及中國共產黨同蘇蒙兩國在意識形態和人員物質方面的聯繫，也使中華民國同蒙古的關係處在一種視鄰里如仇讎的狀態。當蔣介石準備接受蒙古獨立，就立即提出中蒙之間必須同時明定疆界，目的在於用民族國家的邊界壁壘自保。這個在法律意義上確定中蒙各據主權疆域的近現代轉型過程，卻因中共於1949年奪取政權而暫停。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便完成了中國在二十世紀的疆域統一，因此在所有方向上，國界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來得迫切。可以想見，當時的新政權面對這樣複雜的問題，一時無從着手⑥。但是具體到中蒙邊界問題，在中共領導人方面還有兩個可以推斷的特殊原因。第一個是意識形態的原因。1949年以前中共一直視蒙古為革命同志，對中國革命來說是僅次於蘇聯的後援地。1949年中共成功奪取政權，將中國帶到了蒙古所屬的同一社會主義陣營的大纛之下。此時若急於釐清邊界、分出你我，對於中蒙之間新近建立的「同志加兄弟」的關係，多少有些違和之感。第二個是地緣、民族的原因。如本文上篇所述，1950年代中共領導人一直懷有蒙古回歸中國的希望⑦。既然如此，何必急於劃界？

然而，走過漫長獨立過程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卻是另一種觀感。一方面，中共同志在中國執掌政權，使蒙古的南面不再有敵對國家。另一方面，友好的新中國卻很可能導致1945年國民黨政府承認蒙古獨立的翻盤。雖然1950年新簽訂的中蘇條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確定了在蒙古獨立問題上對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繼承，但是蒙方完全了解中共領導人的真實想法，因此常存戒備之心。中蒙兩國在1949年10月中建交，而建交不到兩個月，雙方大使尚未到任，蒙古政府就特地通過蘇聯駐華大使館提請中國政府注意，最近有中國軍人越界進入蒙古地面⑧。1950年4月和8月，蒙古駐華大使館又兩次向本國外交部報告，指中國出版的一些地圖將蒙古一些地方錯劃進了中國版圖內⑨。儘管如此，在1950年代的「兄弟友好」氣氛之下，在中蒙邊境僅僅發生了一些由於人畜越境而引起的局部糾紛。中蒙雙方對這些糾紛採取了就事論事、和平解決的方針⑩。

1950年代中國官方的「同志加兄弟」的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理念，對一般邊境居民的行為造成了甚麼樣的影響，是值得研究的問題。實際上，儘管在1950年代中國政府一時沒有將劃界問題提上日程，但已經開始對邊境居民進行教育，這種教育的內容實際上反映的是當時中國官方對社會主義國家間邊境的理解。1957年，新疆地區對中蘇邊境居民進行宣傳教育的一份材料，對國境線的意義是這樣講的⑪：

二、國境線的意義：在中蘇兩國之間有一道界線，它標誌着一個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以及一個國家的獨立自主和尊嚴。屬於一個國家的